

# 新社會運動的挑戰

吳學燕 譯

本文要旨：歐美一九六〇年代以後，興起了所謂「新的社會運動」，它包括學生、環保、婦女、和平（反戰、反核），以及消費者權益運動。本文主要在論述新社會運動出現後所形成的三種挑戰：第一、它對西方既有之政治社會造成衝擊，第二、它造成學術界對社運另闢研究途徑，第三、在意識形態上，支持者、參與動機、組織結構和政治型態上有別於舊的社會運動（主要是指農民與勞工運動）。本譯文之要旨，在於陳述此三種挑戰之究竟。

臺灣地區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也無可避免的面臨西方工業化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和相同社會運動的發起，透過本文可以使吾人明悉新社會運動的影響所在，從而掌握世界觀，援引為今後國家社會發展之借鏡。

## 壹、新社會運動對政治秩序的挑戰

西方民主政體所面臨新運動對政治秩序的挑戰源自其本身。新社會運動並非對整個政治系統作革命性的一擊，而是希望民主本身有所改變與調適。前述挑戰來自個人及新生社團，他們要求民主政治渠道更加開放，俾容納更多歧異性，以及民間導向的利益團體。這可以從美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工業化的民主政體中，許多與民間利益有關之組織或團體不斷增加，明顯地看出來。挑戰也源自這些市民團體在政治渠道中所產生的新生事務與政治訴求。

至少簡要地說，我們可以提供這一挑戰起源的綜合回顧，追蹤新社會運動對多數西方工業社會造成影響的各種來源。其中有一因素可回溯到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承平日子很快地引起對西方社會目標與民

主政治過程功能的批判。柏克萊的學生針對言論自由與民權等問題造成校園騷動；巴黎郊外一所小規模大學針對管理規則的衝突，擴大為五月動亂，使得法國瀕臨崩潰邊緣；柏林學生的反對運動也使得市區呈現戰區的景象。就像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熱潮一般，學生暴亂在西方工業民主政體散佈開來。

雖然學生運動在幾年內開始消散，它卻註記了社會變遷更加波瀾壯闊的開端，對先進的工業化民主國家有了實質的影響。學生運動所提出的事務雖然了無新意，但是它卻將這些事務中菁英份子的辯論擴大為羣眾運動，而由於參與面擴大之故，爭議內容常超越學生狹隘的意識型態。學生運動也使得一般民眾對傳統經濟及階級問題之政治興趣，擴及於新的社會、文化與生活品質有關的事物，這些都是發生在社會現代化過程所顯現的問題。當市民從傳統的興趣表達方式轉移到更多參與的政治形態，一種新的政治運作形式於焉建立。

本文重點在闡述新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可做為新政治力量的說明。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許多新的環境運動團體在北美及歐洲成立；一個新而更有決斷力的婦女運動加入更早期的婦女團體；消費者與自助團體在一九七〇年代倍增；且這些團體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至少短暫地與重生和平運動聯結在一起。目前這些新團體在許多西方民主政體政治運作過程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組織將公眾的變遷價值，對問題的興趣，轉化為具有潛力的政治力量；他們導引運動的能量；而且他們決定運動的政治目標與戰略。

雖然環境團體、女權主義者、和平組織及其他新社會運動以各類形式出現，幾位分析家聲稱，這些團體的精髓在性質上是西方民主政體中屬於民間政治

的新局面。從學生運動的新左派意識形態以及學生在抗議中所採行的非傳統政治戰略觀之，這些新團體明顯地代表西方工業民主政體既存社會目標與政治形式的根本改變，然而，却沒有那一個新的利益團體可以全然代表這種新的政治形式。不過，它的基本特徵可以從環境團體、女性、及和平運動等各種團體中看出來。西德社會學者以「新社會運動」這個名詞來描述這種現象，因而「新社會運動」這個名詞進入英文研究詞彙中，以便鑑別這種新形式的利益組織。

新社會運動的觀念可能導源於西德社會科學家，因為這些運動為西德社會寫下了戲劇性的新發展，而引起政治觀察家的注意，且由於德國運動強調了經新社會運動觀念所確證的特色。在一九七〇年代民間社運團體的普及，終至一九八〇年綠黨的形成，因而創造了新社會團體脈絡縱橫的網路。西德運動的政治運作並不像其他利益團體或以前的社會運動。

雖然西德運動可以提供最容易見到的新社會運動現象的例子，類似的發展也存在於大多數其他工業民主政體中。荷蘭有一些結構健全的環境團體、自助組織、婦女團體及其他新社會運動。舉例來說，荷蘭環境運動在歐洲是最具震撼的運動之一，荷蘭的和平運動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是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核彈安置最有效的國家團體。丹麥的社會運動變化多端，有的為學生導向，有的則屬非傳統政治團體的強力核心；且這些運動在動員羣眾支持及影響政府運作上獲得極大的成功。英國、法國及比利時的運動顯示類似的政治取向，且以較靜默的方式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如同勞工運動的狀況，美國的社會活動可能是較為特殊的例子，雖然一些美國環境學家，女權主義者及和平團體已經建立了新的政治取向，但是存在於歐洲社會運動間的寬廣意識形態，在美國却較少建立。

新社會運動在不同的領域上向當代政治秩序加以挑戰。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這些運動主張新的社會範型，與西方工業社會中具有支配性的目標結構形成對比。新社會運動也凸顯了一種非傳統政治行動的形式——直接行動的形式——在當代許多民主政體中，與介入利益的傳統性新法人組織模式形成對比。即使前述那些運動的組織結構相當獨特，強調參與式的決策和分權的結構，並反對官僚的程序，然而，新社會運動仍然對西方工業民主政體的基本目標、結構、與組織形式形成挑戰。

新社會運動的支持者及批評者都很快的承認這類的挑戰。橫跨歐洲環境組織的領袖們公開聲明他們代表新式的黨，本質上與其他黨不同。新社會運動在政治理論與修辭上經常毫無拘束地、熱切的發表他們反對既有體制的觀點。新社會運動的反對者甚至高亢的強調新社會運動對西方民主政體的挑戰。常見的批評，特別見諸於保守的政客之間，他們認為新社會運動只不過是革命性及反體制的政治團體。甚而對新社會運動較具思想與學術性的評論家也經常有杞人憂天的聲明。麥克克羅基(Michael Crozier)和他的同僚們一直認為新社會運動代表的社會力量並非對民主政體的挑戰，而是民主的危機。撒母耳漢丁頓(Samuel Huntington)則聲稱西方民主政體因過度民主而受害，而且除非對新社會運動及類似團體的要求與政治活動加以約束，民主秩序將瀕瀕而崩潰。

研究新社會挑戰的學者們彼等係關注正在進行之爭論事項，包括新社會運動目標之意義與先進工業民主政體之政治程序。現代環境運動、婦女團體及和平實力派最近的發展不易達到這些運動真正內含的遠景。除此之外，這些運動也相當分歧。我們可以在這些運動中發現政治哲學實質上之證據，且運動活動者之行爲涵蓋了相等的範圍。有了這樣的多變性，針對新社會運動之意義及內涵而引發爭論，是必然且無可避免的。

## 貳、社會運動研究之途徑

社會運動不斷反覆地成爲社會及政治變遷的一股力量：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改變了西方發展的過程，而美國的民權運動在短短十年間使社會關係的基本面貌改觀。最近涉及環境事務、性平等、消費者權益及有關事項的運動，基本上並不偏離正常的社會進化過程。這些運動的出現及其政治形式很難以既存的社會反對與集團運作之理論加以解釋。

### 一、挫折引介攻擊理論

早期嘗試解釋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反對運動，以及一九七〇年代新社會運動發展的相關研究，係歸屬於集體暴力的研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泰德格爾(Ted Gurr)在「人類為何反叛」中的討論。泰德格爾提出了挫折誘發攻

擊的模型，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在經濟或社會情境中感受到相對剝削感時，就會導致政治暴力。一九六〇年代的民權示威可用這個不滿意的模型來解釋；就如同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對法國革命的描述一般，當黑人們的期望擴張得較實際來得快時，他們的抗議聲浪就出現了。

這種研究的傳統一直在學生激進主義及新社會運動之探討；學生之所以抗議是因為他們缺乏社會影響力，或係因經濟邊緣性而成為激進主義者。有許多個人參與新社會運動，確實是要表達他們對特定政策問題的不滿，或批評一般社會規範。舉例來說，西德綠黨從年輕而未受僱用的大學生獲得極大的支持，這些大學生因為有限的工作機會而感受挫折。研究人員應用類似的邏輯來解釋反性別歧視而形成的婦女團體，為反資本家經濟而產生的環境團體。

不管相對剝削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政治暴力模式的價值如何，它似乎並未指出新社會運動現象的重要性。新社會運動的活動者經常對他們的運動懷着強烈的感情，但這些情感在早期並沒有挫折——攻擊情緒，卻又產生十八世紀的食物及租稅暴動，與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更甚的是，學生抗爭者及環境活動者並非主要來自社會中被剝削的階層。更與此全然相反的，是那些新社會運動的基地是傳統上屬良好階層及特權的學術機構：柏克萊、哥倫比亞、牛津、劍橋、巴黎大學、海德堡及柏林。當許多婦女仍陷身在社交及經濟上不利狀況的時候，推動婦女運動者多係處於富足的女性主義者。簡而言之，這些佔大多數都是屬於中產階級的新社會運動，它的成員在既存的社會及政治秩序中擁有良好利益。

實證的資料對相對剝削模型提供了不確定的支持。愛德華米勒（Edward Muller）在「不滿意與抗爭之關係」的研究發現，對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政治活動者而言，僅有微弱（且非線性）的實證相關性。米勒對一九七〇年代活動主義的更廣泛分析，也無法產生更能說服別人支持相對剝削模型的結論。由政治運作研究引導而獲得之證據同樣發現，相對剝削的感情對傾向於從事抗爭也僅產生邊緣的衝擊作用。隨後針對參與新社會運動動機的研究也不利於相對剝削做為解釋的理論。

喬安古尼（Joan Gurney）與凱瑟琳提尼（Kathleen Tierney）審計了二十年的相對剝削研究，而下了這樣的結論，「由於相對剝削之觀點本身

受太多嚴肅的弱點影響，諸如觀念的、理論的、及經驗的，因而無法有效的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產生與發展」。

## 二、理性的自我利益選擇理論

一個研究政治運動較不同的途徑，是利用理性的利己來解釋市民運作。此一理性選擇觀點使革命及其他形式的集團運作，並非因心理的剝削感情或社會目標的關切而被誘導推動，它只是因為希望獲得私利而推動個人投入政治上的參與。曼克歐爾森（Mancur Olson）是此一理論的首席提議者，他詳細推敲理性選擇模型，而支持個人不會參與大型集團活動，除非他們所期待的利益超過他們參與的代價。否則，有理性的人將避免參與，而又不費力地獲得集團利益。政治運作——從支持革命政黨到參與環境團體等範圍——假設是被這種狹義的利己行為所誘導。惟當高壓或其他外在約束扭曲了此一理性運作方法，此一模型會發生偏差。

此一理性選擇觀點在社會運動學者間是令人耳熟能詳的，但除了一些政治經濟學家外，它並未受到太多的支持。在邏輯與現實主義上的基本瑕疵阻礙了理論對新社會運動的適用性。理性選擇模型在解釋為什麼多數民眾不參與代表他們利益的團體時特別有效，但它卻無法說明仍有少數參與的基本問題。此一模型利用狹義的「理性」來解釋「參與」，將重點擺在經濟的或有限的報償上，利他主義或集體社會獲益的表示法在此一模型中是不允許的，否則將失掉理性選擇計算法在方法學上的雅緻性。

新社會運動動明顯地違反理性選擇模型中許多基本的箴言。大多數這些運動所陳述的目標與集體利益有關——保護環境品質、改善婦女地位、減低國際衝突——與利己行動的理性選擇邏輯直接抵觸。嘗試將這些運動重新劃分做為利己的動因，一般說來缺乏可信度。新社會運動抗爭行動對參與者甚少能產生個人立即獲益（以理性選擇模型而言）；絕少環境學家或和平推動者能確認因他們努力而獲取的私利，即使是花費的代價能輕易地加以評估。此外，經驗的研究顯示，意識形態的與集體的目標對誘導個人參與環境團體、反核抗爭、及其他形式的集體運動要比狹隘的利己來得重要。

### 三、資源動員理論

面對美國日增的民間社團團體，而其與集體暴力及理性選擇理論的要件不相符合，美國的社會學家遂提出政治運作的資源動員模型（resource mobilization model）。資源動員理論家認為政治不滿與社會衝突是與生俱存於每個社會的，因而社會運動的形成並非依賴這些利益的存在，而在於創設組織來動員其潛力，此一觀點引導研究人員將他們的努力專注在檢視動員人力、金錢、及其他資源追求某種動機的組織，與檢視影響創設此種組織的下部結構之因素。

資源動員理論為研討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新觀念架構。它將我們注意的焦點，從市民不滿意的根源轉移到社會運動組織，此組織提出運動的意義和方向。運用此一組織之途徑，學者看到了社會運動的新面貌。舉例來說，一旦形成一個社會運動組織，分析家發現履行社會運動所希望的政策必然會與維持組織本身存在的慾念相抗衡。相對於社會運動所隱含的無形本質，許多社會運動組織乃調整層級性及高度例行性的結構，來加強他們在籌募款項、激發成員、及動員其他資源的效率。組織的計畫意指社會運動組織戰術並非基於受挫折市民情緒的爆發，而是根據如何理想地促進組織目標的意識評估——不管是經由戲劇性抗爭或靜默的政治協商。此外，一些社會運動組織的活動必須朝向組織的維護、動員新成員、及新經濟支援者的運作方向，而非只注重政策影響。資源動員的探討方法也顯著提升了個別企業家在創設及主持這些組織的重要性。社會運動組織要不是因個人或一羣人的發起，經常是不存在的，即使公眾利益的動機已是積年累月。簡而言之，資源動員模型提供了一個關於組織如何形成，公眾支持如何動員，組織態度如何建立，與政治戰術如何決定等的完整理論。

資源動員的方法被廣泛用在美國社會運動的研究上，包括了新社會運動。愛德瓦舒（Ed Walsh）很有效地使用這個理論架構來檢視當地追循三里島事件蹤跡的反核運動。在其他的學者中，喬富利曼（Jo Freeman）則從資源動員之分析美國婦女運動，探究各種婦女團體的目標與組織結構的連鎖性。資源動員被應用在各種團體；從農場工人到反乘巴士團體、聖所遷移，以迄「

母親們反對酒醉駕駛」均屬之。

雖然新社會運動的研究因能用資源動員理論來解釋許多方面的社會運動行為而有助益，此一理論與政治無關的本質似乎遺漏了一個要件，即新社會運動有何「新義」。此一理論似乎不重視一個運動在政治方面或意識形態的內涵；它幾乎以機械學的方式被應用到廣泛不同的政治及意識形態領域，而沒有將這些因素加入模型的作用上。

歐洲人給予意識形態的因素一個更突顯的角色，嘗試著來解釋新社會運動與資源動員方法之對比。許多新社會運動處於領導地位的團體持有一種明確的新左派政治觀點，此觀點是在一九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期間所萌生的。這種意識形態導引新社會運動與西方社會許多一致的目標進行挑戰，採用與傳統的新法人組織形式的利益團體活動相對比的政治戰術，利用新的組織結構做為他們對社會改革理想的延伸。因此，意識形態在討論新社會運動時是不能被忽略的，因為它是包括在資源動員理論之內的。

許多新社會運動的首席學者主張政治的本體影響運動的基礎、結構及戰術，而在先進工業民主政體中產生一種利益代表的新形式。如此說來，新社會運動不只按年代來說是新穎的；他們也代表了同時代民主政治的新貌。總之新社會運動代表了一種政治目標及利益代表模式的性質變遷。

### 叁、新舊運動之對比

主張新社會運動是獨特事物的理論家並未將他們的爭論擺在單一的點上，而是基於集合起來的許多因素，才能道出這種運動的重要性。這些團體在意識形態、起源、結構、形式及目標上所具備差異的一般模式，經常被引證來定義新社會運動的「新義」。這些因素也就是用來分別新社會運動與舊社會運動，諸如勞工或農民運動，及他們自己歷史的前輩。研究人員在是否這些理論化差異存在，以及解釋這些差異的觀點上仍有爭議，但此新社會運動的模型却經常成為新社會運動研究之基礎。

許多新社會運動理論尚未收入英文的研究文獻或仍隱含於主題內。因此，將文獻中對於這些運動所主張的「新義」加以簡要綜合是相當有價值的。



## 一、意識形態

新社會運動定義的特徵是他們所主張的新社會範型，與西方工業社會支配性的目標結構形成對比。譬如，新社會運動通常質疑工業民主政體所強調的財富及物質幸福，他們注意文化和生活品質問題，這些是戰後急於追求富裕的人們較不在意的。新社會運動的意識型態包含了顯著的自由主義要素，它們通常有較大的機會參與影響生活的決定，不管是經由直接民主的方法，或加強依賴自助團體及合作形式的社會組織。這種意識形態的信仰經常導引新社會運動挑戰一致的社會目標——如環境團體反對不加限制的經濟成長計畫，這計畫却對商業及勞工有利；婦女組織致力改變兩性關係的模式，這種關係却已存在了多世紀，或和平團體質疑西方國防政策下的戰略思想。

前述新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是用來區分它們與其它傳統歐洲左派運動與他們自己歷史前輩的主要因素。一方面，這些運動變通性的社會目標常將他們直接與勞工運動競爭。事實上，對環境與婦女運動最激烈的批評，係來自勞工聯盟及一些歐洲的共產黨。對於環境及核能事務的政治爭端，新社會運動經常發現他們自己是被商業及勞工聯盟所反對的。新社會運動的人民黨員及參與價值也與存在於多數已建立的歐洲利益團體的官僚化、層級式及新法人組織主張的趨勢形成尖銳的對比。另一方面，他們新左派意識形態及他們反對既有取向的改革因素，使新社會運動他們自己歷史的先驅，諸如一九〇〇年代初期的參政運動或自然保存運動，加以分開。在美國新社會運動並非單純關切社會需求的民間組合類型，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是要求社會根本的改變。

相關研究者在檢視許多證據之後，確認新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取向，決定了這些運動中，那些是真正具有「新義」。他們明確的意識形態向影響了這些運動動員支持者的形式，組織結構，以及它們政治戰術的選擇。同時，這些新的政治行動者與流行的社會範型間的衝突，造成了維持社會根本改變的承諾與適應當代政治的實際限制間之往返緊張關係，亦即基本主義 (fundamentalism) 及實用主義 (pragmatism) 間的衝突是始終存在的。

## 二、支持之基礎

對「舊」社會運動（勞工、農民、種族運動）的研究經常強調這些衝突的階級基礎。這些運動導源於經濟利益與明顯的社會網絡組合。換句話說，他們出現是代表被清楚界定的社會集團的特殊利益，而運動是依賴有組織的網絡，此一網絡是由所有階級整合而成。社會運動對那些缺乏政治力量的團體提供了其他的政治管道。

許多早期的左派人士認為新社會運動是植基於資產階級衝突的運動，但目前大多數研究人員則質疑以傳統階級為基礎來解釋這些運動是否正確？新社會運動的一個顯著特徵，即他們沒有訴諸任何一個社團狹隘的特殊利益。新社會運動並非由社會經濟上不利地位，或被壓抑的弱勢團體中所產生，環境及和平運動從分享他們目標的個別社會團體獲得支持，而非從明確的階級、人種、或其他社會階層得到支持。即使是婦女運動也是依賴無分性別的廣泛羣眾基礎的支持。

新社會運動意味著由團體為基礎的政治組合轉移到以價值與問題為基礎的組合，它只與社區中具有相同心靈的人們認同。由於缺乏一個堅實而有良好界定的社會基礎，意味著新社會運動的成員流動的趨向很大，參與者加入後，隨後因政治內容及他們個人環境的改變又告退出。

## 三、參與之動機

由上述觀點觀之，舊社會運動中之集體行動係基於自我利益，其與理性選擇理論相符合。農夫動員來維護他們的利益，而勞工參加工運來改善他們的經濟地位。因此這些舊社會運動的目標屬機械性的，即使社會或其他社會團體必須付出代價，它們只專注於如何使集團成員獲益。

相對地，新社會運動之目標常與集體利益有關，而不限於集團的成員，因而違背了歐爾森（Olson）的集體運作邏輯。雖然有些個人在環境團體中可能極為活躍，以他們的立場提出問題，此種器械式的動機一般也是附屬於其他目標之下。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不為狹隘的利己行為，而其動機為意識形態目標及追求集體利益。參與的表現及社會觀促使其他個人變得具有參與感。這種混合動機可由反核的共同陳述而得其梗概。農人穿著黑氈獵衣抗議核電廠建在他們的地區，而大學生的皮外衣也被廣泛的核能政治議題引發為抗爭行動。雖然新社會運動常因各種動機吸引參與者，但後者（大學生的示威團體）較能反映新社會運動的精髓。

#### 四、組織結構

舊社會運動的組織模式正如同在勞工聯盟。多數民間利益團體及其他經濟性組合一般，經常具有集權式、層級性的結構。這種結構使得這些組織可以有效率地動員他們的支持者，並掌握組織資源。以階級為根基與資源為動員之理論家視此為最適合的組織結構，此可從馬克斯韋伯的理性官僚權威的理念，或羅勃特麥克的寡頭政治的鐵則中窺見其梗概。

許多新社會運動的內部結構經常被引證為違背麥克的鐵則。新社會運動的理論家主張這些團體較偏好分權、開放、且民主的結構，如此與他們支持者的參與傾向更能調和。新社會運動的流動性組織結構，從本地區為基礎的市民活動團體，或全國性組織的地方的分支機構更容易看出來。這些團體及其鄰區由於很小，因而擴展組織結構變得不要和不被寄望的，即使在較大之新社會運動，也可看到類似的組織傾向。例如，喬伊斯馬夏彬（Joyce Mushaben）以西德和平運動協調委員會做說明，強調了它對集權式組織結構有意識的排斥，此係新社會運動意識形態擴展的結果。許多環境運動內的組織——譬如丹麥的NOAH，西德的「羅賓屋」（Robin wood），及好幾個「地球的朋友

」的團體，均強調成員的參與，且這些反寡頭政治的意向在綠黨內似乎特別顯著。同樣地，在婦女運動中許多的積極活動者，亦公開地對主導婦運的制度化是婦女遊說方式，持懷疑態度；在有組織的結構中，他們較偏好以本地為行動中心以及自助的團體。

流動的組織結構不僅是新社會運動意識形態的反映，它亦導源於這些運動擴散與流動的社會基礎。新社會運動的支持者雖然很容易被動員起來支持團體的作為，但他們並沒有被整合於團體性的社會網絡中。封閉的社會環境形成工人階層運動的典型（或可相比較的宗教網狀組織），包含勞工聯盟成員及社會黨與其輔助機構所創設的孤立工人階層環境，在新社會運動的情況中是全然沒有的。確實有一個明確的文化環境存在，而能支持新社會運動的活動——逆文化網狀組織在多數城市地區也存在——但此網狀組織是由個人而產生，非受任何組織控制或掌握。新社會運動支持者的反既存價值，與構成舊社會運動基礎一具獨佔性、凝聚性與當事人的組合，兩者正好相反。因此舊社會運動所特有的精英份子動員導向形式，已被新社會運動流動的結構及勸誘的形式所取代。

#### 五、政治形態

許多研究目前歐洲利益團體的文獻，強調協會、商會及其他利益團體具有新法人組織的型態。在新法人組織者模式之下，利益團體接受國家正式或非正式的認可，因而具有正式的地位，可以合法的參與統治治理過程。此種參與包括與政府官員直接諮商，制定法案，在政府管理體系中有正式的代表，與黨有制度化的聯繫，使其在國會中有代表及參與政府諮詢委員會。政府組織及利益團體間保持密切及經常性的聯繫，要將雙方分開是不容易的事。

相對地，新社會運動聲稱許多新社會運動刻意保持在政府體制之外運作。許多環境團體公開拒絕參與政府委員會及管制團體，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很可能會被強迫與他們的目标妥協。新社會運動偏好由政治壓力及民意來影響政策，

而不直接參與傳統的政治。

正如他們有意避開傳統的參與管道一般，新社會運動似乎嗜好運用抗爭活動（雖然抗爭及示威對西方民主政體而言，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就歷史名詞而論，抗爭及集體行動常是個人最後、最終的非常手段，導源於受挫折與被剝奪的感覺。集體政治行動常是自發事件，例如一羣沒有組織的羣衆發起暴動，或攻擊政府當局。雖然有些舊社會運動的集體行動是有計劃的，抗爭則經常是無法控制的政治爆發行為。

然而，新社會運動的活動顯示抗爭本質已變成一種政治形式。抗爭行為在現代的民主政體中已變成一種有計劃與組織的活動，且新社會運動是這種發展的前鋒。有些抗爭活動，參與者乘坐包租的巴士到預先計劃的集結區域，示威協調人及媒體設施均極完備。抗爭單純變為影響民意及政策決定者的另一種政治資源。

新社會運動也較為強調媒體俾做為動員民意之方法，媒體可使社會運動擴展及於整體羣衆，這些運動的非傳統性行動主要是計劃，使媒體受其影響。例如在格林漢科曼（Greenham Common）建造婦女營，橫跨萊茵河建一座人橋，戲劇性凸顯水污染問題，或組織羣衆示威行動，都是為了吸引媒體注意及動員公衆支援為目標。

新社會運動在政治上強調自治，影響及於新社會運動與政黨間的關係。已建立的政黨對新社會運動的政治需求的回應往往猶豫不定，部分的原因是由於新社會運動在選票上的影響力有其不可確定性，而政黨仍需依賴他們的工業化法人組織的選民。譬如說，愛伯特梅盧西（Alberto Melucci）認為新社會運動無法像舊社會運動組織那樣進行談判，因為它缺少一個高度結構、凝聚的組織來提供選舉資源，新社會運動沒有什麼可提供給政黨的。

因為政黨政治與新社會運動的形式及規範多少有些不同，新社會運動非政黨的本質也就會發生。大多數政黨係由精英份子所控制的，且其層級組織與新社會運動的組織形態背道而馳。菲利普勞（Philip Lowe）與珍高斯勒（Jane Gorder）因而認為多數英國環境團體與政黨政治保持相當距離，另外，盧梭達爾頓（Russel Dalton）發現整個歐洲社區的環境團體亦有相同的特色。

同樣類似的情形，有好幾個西方民主政體的婦女運動公開地避免與政黨有所瓜葛。

新社會運動非傳統的政治行為有時候可追蹤至其具體政策上的衝突，而將這些運動與多數法人組織系統的商業——勞工——政府聯盟加以分開。嘗試與社會——政治實體談判常導致其相對價值的衝擊。新社會運動也感覺與政府體系密切合作，可能受到具優勢的工業化法人組織利益的影響，造成運動被合併和缺乏急進性。譬如說，一個具領導地位的西德環境團體堅拒將他們的全國性辦公室遷至波昂，因為他們害怕與決策者過於親近整個組織會受到影響。一種反政治實體的強烈的情緒充溢於新社會運動中。

新社會運動非傳統的政治形態亦導源於他們的民粹黨員身份及結構鬆散之國會外實力派。由於缺乏堅固的社會基礎及正式成員（如聯盟與教派），新社會運動必須經常關切動員資源。因而這些運動的一些活動即以組織維護、吸收新成員、籌募基金等為其目標；而戲劇性的作秀事件乃為吸引公衆注意的最佳方式。幾年以前，一艘荷蘭「綠色和平」船導演了一幕從比利時當局戲劇性脫逃的事件，然後使用此逃亡的電視影片替組織籌募了好幾百萬荷蘭幣經費。新社會運動組織如同鯊魚一般，他們必須不斷活動以保持生存。

很少有組織符合我們所描述的所有特徵，但是新社會運動模型所具備的要件可以從環境、女性與和平組織中明顯地看出來。如果新社會運動不斷建立這些特色，並擴大他們的影響，則可能在西方民主政體利益團體活動與法人組織政策決定的穩定結構中產生基本的變化。當然，研討關於新社會運動特色的這些論點，並評估這些新社會運動對當代政治次序的衝擊，是有其實質上的理由的。

（本文譯者：吳學燕現任中央警官學校教授兼行政管理系主任）

註：本文譯自

Russell J. Dalton, et al.: The Challenge of New Movements.  
R. J. Dalton & M. Kuechler (ed).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1990. Polity Press, Cambridge. UK.